

未來書城
葉秀山◎著



中西文化會通

下

就傳統來說，中國有沒有哲學？長期以來，這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。

這問題不能空想，而是要腳踏實地地去做，去讀，去思考。



中西文化會通（下）

葉秀山◎著

未來書城

中西文化會通（下）／葉秀山著。 -- 初版。
-- 臺北市：未來書城，2003[民92]
面：公分。 -- (文學書；109)
ISBN 986-7797-86-8(平裝)

1. 哲學 - 中國 - 論文, 講詞等 2. 哲學 - 西洋 -
論文, 講詞等 3. 哲學 - 比較研究

107.

92011444

中西文化會通（下）

作 者：葉秀山
執行編輯：羅春玲
版型設計：顏英如

編 輯：李傳薇、楊文荃、黃淑雲、趙士珍
祝子慧、簡伊婕
美術設計：顏英如、李雅雯
行 政：鄭淑芬、張斐清、黃淑君、徐啟明
行銷企畫：呂彥廷、黃亭珊

發行人：侯吉諒
出 版：未來書城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：臺北市 105 敦化南路一段 7 號 5 樓之 1
電 話：02-25793456 · 傳真：02-25796789
劃撥帳號：19488721
網 址：<http://www.ebookcity.com.tw>
電子信箱：to@ebookcity.com.tw
定 價：250 元
初版一刷：2003 年 10 月 1 日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總 經 銷：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：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三路 8 號 5 樓
電 話：02-22983838
傳 真：02-22981498

ISBN：986-7797-86-8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中西文化會通（下）

葉秀山◎著

東來書城



目錄 CONTENTS

說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／004

再談學者的使命／013

中國藝術之「形而上」意義／022

「和諧」／035

——孔子和蘇格拉底的共同「理想」

古今中外有分有合／054

想起了「語言是存在的家」／083

京劇的學術意識／097

——讀蔣錫武《京劇精神》有感

西方哲學研究中的中國視角／107

王國維與哲學／125

書道貴新／154

答韋君琳先生書／159





- 試讀〈大學〉／164
試讀〈中庸〉／181
說「變」／202
由譚鑫培七張半唱片談起／208
史家的哲學問題／216
我的讀書方式及其沿革／226
溫故而知新／238
創造與傳統／241
——新世紀哲學斷想
京劇的不朽魅力／274
說「誠」／282
從屈原的死談起／292

中西文化會通（下）





說「五十而知天命」

孔子說他十五歲立志學習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耳順，七十歲則隨心所欲而不逾矩，（注：《論語·為政》。）說這話時已過七十，孔子死於七十三歲，所以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境界，未曾持續幾年。

為什麼已「知天命」之後，又過了二十年才「隨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？孔子說他「五十而知天命」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「天命」不就是「天道」——最高智慧嗎？認識了「最高智慧」還要等二十年才達到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「最高境界」，不是很讓人不解嗎？

孔子這段話是他一生經驗的總結，有自己的具體意義，也有普遍的意義，所以我們至今還常說「已過而立（不惑）之年」這樣的話，可見幾千年來，歷史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但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似乎仍然大同小異。

孔子一生目標是要在紛亂的世界中建立一種秩序，希望天下由亂到治，而他認為「亂」是「現在」的事，「過去」堯舜周公的天下是「治」的，所以「未來」的「治」，當是「過去」的



「重複」——「恢復」。「過去」之所以「治」，乃在於天下萬物（包括人）都各有其自己的恰當的位置，按照自己的應有的「份」，來發揮作用並得到應有的「補償」。天下各安其位，行其所應行，得其所應得，則就是天下歸「仁」，「安於位」就是「安於仁」，過與不及、越位或不到位，都是「不仁」。「不仁」就「天下大亂」。「亂」，就是天下萬物「錯位」。譬如作「父親」的不教、不慈，是為「不仁」，作「兒子」的不孝、不養，是為「不仁」，為「君」的「不愛民」，為「民」的「不服從君」，好犯上作亂，都是「不仁」，都會「亂」，「仁者愛人」，這個「愛」也就是就其「位」而「愛」之，不是普泛的「愛」。譬如父親愛兒子，但如果不嚴加管教，則是「溺愛」，是「害」了他，不是真「愛」他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教而誅，在長者是為「不仁」。所以孔子的「仁愛」是有區別的——也可以說是有等級的「愛」，是具體的「愛」，不是抽象的「愛」。

抱著這個「愛國（天下）」、「愛民」的「仁愛」思想，孔子三十歲「立」於世。「立」什麼？「立」是指「立」「命」，即「立」自己的「使命」。——要使天下大治，這種「治」，建於萬物得其「位」的「仁」「愛」基礎上，則不會再「錯位」，則會長治而久安。到四十歲，這個「志向」（命）已經達到不可動搖（不惑）的地步，無論世事如何紛亂，這個「命」——「使



命」都堅如磐石，只是勇往直前。

然而，三、四十歲只是堅定地「立」定一個「志向」，還是主觀的，到底這個「志向」能否實現，或者實現的程度如何，這時還是沒法估計到的。三、四十歲正是所謂「主體性」高揚的時候，以天下為己任，要想實行自己一套的主張。到了五十歲，可謂達到一個人事業的頂峰，也正是這個時候，孔子的事業有個大起大落。先是由都宰升到司空、司寇，有了行政權，後來又遭冷遇而退至二線、三線，轉向教書育人，並率徒周遊各國，以求能行其道，終因未見採用而更退至政治舞台的「後台」，集中力量致力於學術工作，整理古代文獻，與學生們探討各種問題，闡發自己的思想，學生們記錄下來後，成為中國的文化經典《論語》這本書。

從這個歷程來看，所謂「五十而知天命」的意思就比較清楚：原來三、四十歲時的「主體性」高揚的銳氣受到了阻抑，在奮鬥之後，「知道」還有一個比自己「立」下的「使命」更為有力、更為強大的「使命」——「天命」。「天命」是「上天」給你下達的「命令」、是「天」規定了的你的「使命」。世界上的事，並不是你想作什麼就可以作什麼，即使你的想法是對的，也不一定能夠作得成，你立身在世，所能作的事，只是去努力完成「天」「分配」給你的「任務」，這是你應該作的，也是你可以作的。康德說，他的哲學是要讓人弄清楚：到底人能（被允許）



「認知」什麼；人「應該」作什麼；和人能（被允許）「希望」些什麼，明白了這三個問題，也就知道了「人是什麼」。孔子對人生在世——在現實的感性世界能（被允許）作些什麼是很有體會的，他總結，這種體會，在他五十歲的時候，在他的事業進入高峰而開始下降後，體會出來了：我孔子只能（被允許）作什麼事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「知天命」不是智慧、學問的終結，更不是生命的終結，而只是「開始」；於是，孔子六十歲「開始」「耳順」了，到了七十歲，進入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狀態。三、四十歲的人，「志向」很大、很高，「主體性」高揚，但並不能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可能碰許多的釘子，或者消極頹廢，或者憤世嫉俗，情緒有許多波動，到五十歲後，就可能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了，不再那樣消極頹廢，也不再那樣憤世嫉俗，而可以努力地、安心地去完成自己該完成的事業——德國人叫 *Bestimmung*，英、美人叫 *vocation*，中國人也叫「天職」，譬如撫養子女是父母的「天職」等等。這樣，再有十來年，「耳」就「順」了，不會因為「他人」的意思不合「己意」，就聽不進去。「順」者乃是「順」「天命」的意思；「天命」只能「順」，不能「逆」的。這樣，再過十來年，自己的純粹的「主體性」被「改造」了，心裡想的，已不是那「不很可能」的、「空洞」的「應該」，而是在「知天命」、「耳順」之後，盡自己應盡的「天



職」，所以，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「心想事成」，想作什麼就能作什麼了，「應該」和「可能」統一了，「人」和「天」統一了。不過，這時「人」已年過七十歲，還有什麼作為呢？所以，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似乎只能是一種短暫的「境界」了。

無論如何，按照孔子的經驗，在人的生命的歷程中，五十歲是很重要的，它提示你，該作些什麼，不該作些什麼；能作些什麼，不能作些什麼，你的「天職」是什麼，用現在的話說，你五十年的經驗給你的人生「定了位」。有了這個「位置」，你如果再「越位」、「僭妄」，或者放棄這個「位置」而「不到位」，則是為「不仁」，就不是「君子」了。

「定了位」不等於「到了位」，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己「到位」，所以五十歲是一個「開始」，而不是「終結」。我們固然不能說「人生從五十開始」，但卻可以說「人生真正的事業從五十開始」。

從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這個年齡似乎太慢了，現在強調要年輕化，孔子這個說法有些不合時宜了；不過，我認為就「學術」的「事業」言，孔子這個說法，是相當準確的。從實際的情況來揣測，孔子說「五十而知天命」這個「天命」的更為具體的意思就是：他意識到他這一生是要從事「學術工作」的。



就學術工作而言，「五十」歲常是一個分水嶺：是成熟期，也是某種意義的「開始」。

當然，學術領域內也有許多的「天才」人物，他們在很早的年齡就有劃時代的學術成果，像王國維只活到五十歲，他的學術成果就十分可觀；當然，我們可以假想他不自殺，活到七十歲，這二十年時間的成果可能更加輝煌——我們只能說，「天才」畢竟是「例外」，一般來說，「大器」總還是比較的「晚成」的。幸好我們的「至聖先師」、「萬世師表」不是這種「天才」式人物，而且留下有明確的「人生經驗總結」——他是五十歲才「知天命」的，以後以二十年的功力從事學術活動，才達到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程度。這為我們這些老而無成的人提供一種安慰：孔夫子如此，何況吾輩！

更何況，自孔子以後，學術經驗又累積了兩千幾百年，就歷史傳統的學習來說，已不光是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只我們自己的傳統就有浩如煙海的典籍，不要說十五歲開始「學」，就是在娘胎裡開始「胎教」，用通常的辦法，絕對「學」不過來。

更何況，如今開放時代，而且近百餘年來，中國受到東、西洋文化的影響，需要知道、學習的事不知多出許多來，需要學習洋文、洋書，要與洋人交往，而日月周天的運行和孔老夫子時代差不多，一天只有「十二個時辰」（二十四小時），就是不睡覺也學不過來。



更何況，如今是訊息化時代，不但有印刷出來的書，而且有電影、電視……更有電子計算機，信息高速公路，我們要「知道」的，不僅是聖人、學者、專家的意思，就連普通人的意思也不能完全忽略。孔子就說過「三人行必有吾師」，按這個比率算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師，過去他們的「話」我絕大部分是聽不到的，馬馬虎虎也就罷了，如今他們的「話」我們可以聽到、讀到的，愈來愈多了，憑什麼你能「不聽」？這樣，我們要累積經驗，想出一些辦法來，鑑定哪些「話」要「聽」，哪些「話」可以暫時「不聽」。

更何況，我們當中大多數人也和孔夫子一樣，不一定早年就認識到自己的「天命」——什麼該作，什麼不該作，什麼是能力所及，什麼是能力不及的等，而是付出多年的代價，作作這個，又作作那個，慢慢地才找出自己的「位置」來，這時也真到五十歲了。

更何況，世事的變化有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一代人有一代人「浪費時間」、「虛度年華」的苦惱，而有些是不能由他們自己負責的。譬如我們這代人，經過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加上各種「運動」，有十多二十年時間不在作自己的工作，按孔子的十年一進的計算，已經「浪費」了兩個跨度，所以只能是「七十」「知天命」了。或許，現代條件好，存活的時間比古人長，七十已不「稀」，活到九十歲，把這個跨度補回來了，但八、九十歲的人，精力當然比不上五、六十



歲，所以實際上不容易補回來。

凡此種種，無非說明，學術性的工作耗費的時間要長一些，五十歲為一關鍵，是比較合適的。近讀牟宗三先生《五十自述》，知道他在五十歲同意印行自述的全部，可見五十歲對他的學術生涯也是一個轉折點。

就孔子而言，他從五十歲知天命後，又經過二十年，才有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之感，可見學術工作的難度；不過，同時也說明，在學術領域裡孔子找到了他在實際政治領域裡所沒有找到的感覺：在學術領域裡，他得心應手，真的使「應該」的變成了「可能」的、「現實」的了。從這種感覺，反過來又印證了他在五十歲時所體會出的「天命」、「天職」感，是正確的、合適的，他以二十年的努力，果然達到了智慧的最高境界——「自由」。

「自由」是「自在」，都出於「自（己）」。「自由」必先「知己」——蘇格拉底所謂「認識你自己」；在孔子的意義上，就是「知天命」，認識我自己的「天職」，而不只是「為所欲為」地「主體性」高揚。

「自己」是「什麼」？「自己」為「自己」的「本性」。《中庸》說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「性」是「自己」的，也是「天」「賦予」的，世間萬物的「性」，是「天」（自然）「賦予」



的；「人」的「自己」的「性」，是「社會」、「他人」所「賦予」的，當然，也是「自己」努力去「完成」的。「人」以「自己」工作、績業去「充實」這個「性」，使它凸顯出來，所以不是不努力，而要很努力去「完成」這個「性」，使之「完滿」、「圓滿」，使之「盡」。從一個意義來說，「命」和「性」又都不是「先天」地注定的，因而要到五十歲以後才能找到這個「定位」，在這之前只是一個「空位」，是一個「X」；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一定去找到這個「位」，否則將一事無成，達不到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「自由」境界。

於是，「自由」不是「胡思亂想」，而是「知己」，認識自己的「本性」；而這個「本性」，也不是「想作什麼就能作什麼」，想當「帝王」就能當得成的，更不是生下來就注定了的。「天命」不是「人的命，天注定」的「迷信」。「人」的「本性」，是具體的社會實踐的「結果」，是透過體驗、思考、實踐經驗得來的，在這個意義上，你的「本性」，是你自己的「創造」，也是「他人」的「賦予」，所以，孔子才說，「人貴有自知之明」，這個「自知」，就是「知天命」，而孔子是五十歲才體驗出來的。

（原載《開放時代》一九九四年第四期）



再談學者的使命

幾年前我以這個題目寫過一篇文章，那是那個時候的背景，現在再寫這個題目，有現在的想法。

顧名思義，學者是作學問的。什麼叫「學問」？「學問」就是「學」加上「問」。「學」是要知道「什麼」(what)，「問」就是要問個「為什麼」(why)，當然也包括問「什麼」在內，但主要是問「為什麼」；「什麼」和「為什麼」這兩方面又是不可分的。「what」很重要，「why」也很重要。「what」和「why」加起來，就是「how」，把握了「how」則把握了「規律」，而「把握規律」乃是作「學問」所追求的目標，儘管這個目標是要「學者」終其一生去努力的。

天下的「什麼」(what)多不勝數，學者們也不能盡知；不僅如此，學者所研究的「what」或許竟是人人皆知的，譬如研究「蒼蠅」、「蚊子」，學者的「使命」就不在於指出「這是蒼



蠅」、「這是蚊子」，而要告訴人們牠們的「內部結構」。知道了事物的「內部結構」，對這個事物的理解也就深入了，「what」還是那個「what」，對普通人和對學者（科學家），則會有不同的意義。這就是說，知道了「why」（how），這個「what」也會有另一種面貌。

所以學者（科學工作者）的「使命」大部分還在於弄通這個「why」，而教育人們對我們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這樣，學者的使命就在於——用我們常說的話來說——把「感性認識」提高到「理性認識」的層次上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學者、科學家當然首先要跟著感覺走，要以感性世界為依據，但不要忘了那個「走」字，人們並沒有說，「躺在那裡」「不走」，而是要你「走」。「走」到哪裡去？「走」向「理性」。人往「高處」「走」嘛。

我心裡有這樣一些想法——這些想法也許不對——再來看有些學者的文章，就會產生一些不同的意見，儘管其中有的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老師，有的則是前途無量的青年學者。

譬如，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，說中國思想方式是「綜合」的，西方則是「分析」的，並以作飯的「食譜」為例，說有人按「食譜」死作，飯吃不得，是「上了西方哲學的當」。這個說法即使就文學的筆法來說，也是過於調侃了。